

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丛书

牛西平 郭飒飒◎著

周秦伦理思想探微

ZHOUQIN LUNLI
SIXIANG TANWEI





周秦伦理文化研究丛书

牛西平 郭飒飒◎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周秦伦理思想探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秦伦理思想探微/牛西平, 郭飒飒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24-08119-0

I. 周… II. ①牛… ②郭… III. ①伦理学-思想史-中国-周代 ②伦理学-思想史-中国-秦代 IV. 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1786 号

周秦伦理思想探微

作 者 牛西平 郭飒飒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8.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119-0

定 价 19.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一、周秦伦理文化何以可能的

历史哲学分析 (1)

二、周秦伦理文化的历史定位 (4)

三、周秦社会发展状况概述 (9)

第一章 周秦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 (17)

一、敬德保民：西周政治伦理的核心 (18)

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29)

三、轻教化重刑罚：秦代政治伦理 的主要内容 (63)

第二章 周秦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69)

一、西周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72)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伦理思想 (76)

三、秦及秦朝的经济伦理思想 (110)

第三章 周秦时期的生态伦理思想 (118)

一、西周时期的生态伦理思想 (121)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生态伦理思想 (131)

三、秦及秦朝的生态伦理思想 (152)

第四章 周秦时期的家庭伦理思想 (159)

一、西周时期的家庭伦理思想 (160)

二、春秋时期的家庭伦理思想 (175)

三、战国时期的家庭伦理思想 (183)

四、秦代的家庭伦理思想 (188)

五、先秦儒家的家庭伦理思想 (196)

第五章 周秦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 (205)

一、周秦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206)

二、周秦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221)

三、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234)

四、周秦家庭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249)

参考文献 (261)

后记 (265)

导

论



一、周秦伦理文化何以可能的历史哲学分析

这里要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周秦伦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去研究，这种研究到底具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它作为一门学问的合法性问题。笔者之所以去研究“周秦伦理文化”并非仅仅是出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的眷恋和偏爱，而首先是出于考虑到周秦伦理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轴心”地位。“轴心时代”（Achsenzeit）一语出自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年）一书。雅氏指出：“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人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Axial Period）。”“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

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①在他看来，“轴心期的概念提供了借以探讨其全部发展的问题和标准。……轴心期同化了存留的一切。从轴心期起，世界历史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至少持续到我们时代的统一”^②。而“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③。简言之，轴心时期的文化既规定了这一文化的基本形态，又对于以后的每一次文化复兴都起到了精神原动力的作用。马克思在谈到古希腊文化时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他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人类历史上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

① 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第15页。

③ 同上，第14页。

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①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和雅斯贝斯的理论旨趣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化（即雅斯贝斯所讲的轴心期文化）对于整个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重要价值。

我们要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也应当搞清楚中国文化的轴心时期，明确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型。根据雅斯贝斯把文化轴心期界定在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的理论，中国文化发展的轴心期大体就是从西周后期始，经历春秋战国，到秦朝这一历史时期，相当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欧洲人总是在回顾希腊，中国人也总是不断回顾自己的这一轴心期。因为“轴心期”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一个政治分裂与社会动荡的整合时代，因而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与危机感，衍生出浓烈的忧患意识并努力实现对现实忧患的超越，从而激发了人类精神的觉醒，形成了文化发展的繁荣期和文化范型确立的时期。在这里，笔者要说明的是，一般都把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期，笔者之所以要强调西周时期，原因有二。第一，从历史年代的契合上说，应当包括西周时期，至少应包括西周末期。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西周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时期，而且对春秋战国乃至整个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的源头就是周文化，孔子曾多次提到了周文化对于自己的深刻影响。此外，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国文明能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地发展起来并能够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内在统一性和连续性。虽然秦汉以后西方文化开始与中国文化交汇并融合，但始终未能对中国文化产生根本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的影响和改变。雅斯贝斯之所以把第一轴心期的文明认定为希腊、犹太、中国、印度，而不是传统印度、巴比伦、埃及、中国四个古代文明国家，一个可能的原因就在于雅斯贝斯的认定非常重视这种文化对该民族、地区的后来的文化的引领和奠基作用。应该承认，周代的文化就是中国轴心时期文化的主流形态和指导价值观念。但以周文化为渊源的儒家文化并不能等同于整个中国伦理文化的整体精神。这里还应注意与其同时的其他思想文化的价值，因为后来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对这些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吸收。

二、周秦伦理文化的历史定位

儒家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虽然儒家在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其思想内容在不断地丰富并有所变化，但儒家文化的伦理本位、精英定位及其伦理内容的基本内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而其源头就是周文化。笔者此处试图以周文化的代表人物周公的伦理思想为例，论证其与儒家伦理文化的源流关系，彰显周代伦理文化对整个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周公制礼作乐，借鉴于夏商二代，有所选择，有所发展，把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了发展顶峰。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文化形态，而周公是礼乐文化的最重要的创造者。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即“敬德保民”。“敬德”，是因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有德才会得到上天的保佑。“保民”，是因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保民”实际上就是保社稷、保国家。周公提出“敬德保民”，是夏商以来中国思想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一大转变。《尚书》说：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基本上概括了周公的历史功绩。周公在“因于殷礼，所损益”的基础上，创立了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礼》规定了周代各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分封制、嫡长子制、严密的宗法制、等级官制，以及许多礼制，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等。它区别了以维护、巩固上下贵贱宗法等级关系为目的，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度格局。“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礼乐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它的基本特点是，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明贵贱，辨等级，正名分，一切人和事都要遵循礼的规范和准则。“礼”分为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五种。五礼的节目繁多，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乐，通常与礼相配合，行什么样的礼，配什么样的乐。礼乐配合，文质彬彬，可谓尽善尽美。但我们必须明确，在规定了诸多的“礼”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规定了“礼”的适用范围，即“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上》）。孔子由衷地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作为其继承者的儒家伦理文化非常强调周人伦理文化的一系列范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在这里孔子认为人就应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周礼的规定，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仁人。可见，孔子是要重新巩固和确立周礼所制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孔子也坚持了“亲亲”的原则作为仁的根本原则，维护周代制定的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度。

此外，“孝”、“爱人”、“德”、“礼”、“乐”、“和”等范畴都与周代的伦理文化有着直接的承袭关系。从《周礼》对“婚礼”的相关规定来看，“礼”从其本质和功能上讲是一种对社会精英的伦理要求，而非对社会大众的普遍伦理要求，但在精英伦理与大众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对儒家和中国人的伦理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关于婚礼，《礼记·郊特牲》说：“天地合而后万物兴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昏义》亦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谓“附远”、“合二姓之好”，都是要使周族与异姓通过婚姻关系变得亲近起来，形成一种以亲戚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合，这是西周时期特别是其初期的政治需要。“同姓不婚”之礼制虽然有优生学上的考虑，但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其更多的是与政治上的分封制和宗法制密切联系，其旨趣所在也是从维护周天子“天下大宗”地位出发，积极与异姓联姻，巩固周天子统治。正由于西周婚姻具有强烈的政治联姻性质，因此周人对婚姻之礼十分重视，也特别强调双方家族的政治地位。当然，这种政治联姻所约束的对象也就是王室和贵族了。我们也承认，显然在周公和儒家的思想里，更多的则是强调婚礼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功能的，对象也显然主要是王室、贵族等。在周代的官制中也有婚姻的专职管理人员，民间的婚姻也因循着“婚礼”的一般规定，甚至在今天的婚俗中仍能看到。也就是说，婚礼已经成为中国婚姻家庭文化的一般伦理规定。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周代伦理文化对以后时代的多方面的影响。

在这里，笔者试图通过对周公的伦理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的渊源关系的考察为例，来说明研究周秦伦理思想对于研究中国伦理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下面就仅仅通过孔子及以后诸学者的论证

证明之。孔子本人多次肯定了他的伦理思想与周公伦理思想的内在关联。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他自己以周道的继承者自居，并力图复兴周礼。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论语·述而》篇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说，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我很久没有再梦见周公了。甚至称赞“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在这里，孔子认为周公的才能和美德谁都比不上，周朝的道德就是最高的、最完善的道德了。在“德治”方面则坚持和发展了周公的思想。具体表现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也强调要保民、富民。《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解释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民富之后为何要“教之”、“以何教之”，朱熹解释道：“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孔子也在坚持和贯彻周礼，《论语·先进》篇说：“为国以礼。”只要“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只要善于运用礼，就能很好地驾驭老百姓，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为此，他要求人们从语言到行动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对于那些破坏周礼的僭越行为，孔子更是痛心疾首，“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惶惶然如丧

家之犬”奔走于列国，其目的就是想恢复周礼。《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成也。”《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杨宽先生解释为：“这是说有人召我去，难道是徒然白白召我去的？假如有人用我，西周的治道就可以在东方传播了。”

孔子以后的思想家大多都认可孔子和周公的伦理思想之间的渊源关系。《淮南子·要略》说：“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孔子开宗立派，首创儒家学说，寻根溯源，乃植本奠基于周公。”韩愈实际上也论证了周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昌黎集·原道》）陕西岐山周公庙保存的一通清代康熙十九年《重修周公庙募缘疏》石碑，碑文乃“关学三李”之一的李柏撰写，碑文开头便为：“道生天，天生尧舜，尧舜以所得于天之道传之禹、汤、文、武，禹、汤、文、武传之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则是，周公之道，上承尧舜而下启孔子者也。承尧舜，则尧舜无子而周公其子，启孔子，则孔子无师而周公其师。”钱穆先生言：“周公之定宗法，则固兼存天下之万姓百氏，而同纳于此一礼之中，固不限于为一姓一宗之私而已也。故孔子虽殷后，亦深契于周公制礼之深义焉。”^①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孔子，不能谓由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此一传统则来自于周公。杨向奎先生的

①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一书中,在谈到关于周公创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历史渊源时曾写道:“没有周公不会有武王灭殷后的一统天下;没有周公不会有传世的礼乐文明,没有周公就没有儒家的历史渊源,没有儒家,中国传统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种精神状态。”^①刘起钊说:“孔子之学全部与《尚书》有关。他的学说的主干,就是承自周公的四项遗教,完全是从《尚书》篇章中周公的各篇诂词中学得的。”^②陈来先生说:“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我们知道,周公的个人魅力、他所开创的事业以及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数百年后的另一个伟人——孔子,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 1500 年间,中国文化一直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一脉相承的联系,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公创立的以礼乐文化为特征的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文化的直接来源,周公的伦理思想的精英性质决定了作为他的思想承袭的儒家伦理必然是一种精英伦理。

三、周秦社会发展状况概述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周秦两族的崛起都是在以周原为核心的关中地区。为了论述方便,在此将周、秦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梳

①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1 页。

② 刘起钊:《古史续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5 页。

③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三联书店,第 196 页。

理，目的有二：一是避免对周秦伦理文化的平面化的理解，强调其历史生成性；二是从中直观地展现周秦伦理文化的同质性和承袭性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

关于周族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周人的先祖是弃。《史记·周本纪》中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誉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里的有邰氏是炎帝之后，姜姓，封于邰，是弃之外家。对这一问题，钱穆先生则认为：“周人自后稷前，已远有原始，特周公断以后稷为周人之原始也。”^①那么为何要断为后稷呢？钱穆先生解释道：“特以后稷教民稼穡，生事所赖，人文大启，乃因而尊奉之、截取以为人类之始祖也。此可谓之人文祖，非原始祖。”^②“周公之远尊后稷，犹有其重视农业、重视民生之深意存焉。”^③而弃“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后帝舜因弃事农之功，“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史记·周本纪》）大概姬姓就源于此。弃之后，历不窋、鞠而至公刘。从公刘迁豳（今陕西旬邑与彬县一带，后又扩土至长武）至古公亶父，长达 370 余年未迁。《史记·周本纪》

①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7 页。

②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8 页。

③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M]，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9 页。

载：“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至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诗经·大雅·绵》云：“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庄子·让王篇》记载：“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孟子·梁惠王下》云：“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通过以上记载，可以确信，约在殷王武乙时期，公亶父被戎狄、殷朝逼迫，离开经营数百年的比较富庶地区豳（豳地在今陕西彬县、旬邑及长武，位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南部。丘陵沟壑地多于平原），迁于豳之西南的岐阳，开辟新城并营筑都城，建立新的诸侯国，国号仍为“周”，国民称周人，国都所在地称“周原”。

从此，周诸侯国就以岐地（亦称周原）为根据地，开始了“翦商”大业。西伯昌称“王”后，追封古公亶父为太王，又称太王亶父。而其部族所居的岐阳（今陕西岐山县与扶风县）在岐山以南、渭水之北，土地平坦肥沃，水力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有利于向外的进一步发展。《诗经·大雅·绵》云：“周原既臚，稇茶如飴。”在适于种植百谷、蔬果的这一肥沃土地“周原”上，即使是种下苦菜一类的植物，也会长成滋味甜美的食物，适于发

展农业和人们居住。从岐山、扶风、眉县等地出土的商王武丁以前铜器（如岐山县京当窖藏铜器）、陶器群（扶风县白家窑水库出土）看，虽然也属于商的势力范围，但其对周原地区的控制力十分薄弱，有利于周人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另外，岐阳地区是姜姓炎帝后裔的故地，相传还曾是岐伯古国地。岐阳以西的陈仓之地更是炎帝故里，羌部落又与姜姓人关系密切。因此，历有婚姻关系的姬姜两族人更利于和平共处以至联合，进而联合羌族，共抗戎狄。加之周人“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这些都为日后周灭商而代之准备了条件。经过历代周人的经营，终于灭了殷商。周武王死后，周武王之弟周公成为周的实际统治者。周公在中国文化史和伦理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周人的历代先祖及其后继者。制礼作乐，是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莫大贡献，其伦理思想成为中国伦理文化的源头。

限于篇幅，仅通过对秦人的历史的概述为线索和主轴介绍春秋战国至秦朝的历史发展状况。秦是西周东迁时才被周平王承认其为诸侯国的。对于它的起源，很早就有不同的传说。《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秦族与殷人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和殷商都是玄鸟图腾的支族。《史记·秦本纪》载：“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